

## 老母亲

虞忠能

女儿在外住校，两星期回一趟家。这次回来，妻子念叨着说女儿又高了些，得买几件新衣服了。看着娘俩亲亲热热地拉扯着衣服，不禁想起了往事。

我辍个儿是在读师范的时候，当时在余姚读书时，为了省车费，我常常一学期才回一趟家。记得有一次回到家已是傍晚，母亲不在，邻居说在裘家夜市卖小菜。我连校服都来不及换就小跑着去找母亲——已经快半年没见着了。老远看见母亲正在打秤，心里很喜欢，一边跑过去一边对她微微笑着。没料到母亲却招呼我说：“小同志，你是余姚师范的吧？你回来了，可看见我家忠能回来没有？……”我愣一愣，哑然失笑道：“姆妈，我就是呀……”母亲又惊喜地看着我：“哎呀，高了介多！姆妈都不认得了！”

仿佛一切还在昨天，母亲和我的对话还那么鲜明。可是转眼间，女儿已经到了当年我的时光，我已是不惑之年；而母亲，老了。

母亲确实老了。曾经乌黑的头发如今夹杂着很多黄的白的发丝，一双手皱皱的，年轻时的鲜活红润被时光一丝丝消磨去，矮小的个儿与高大魁梧的我站在一起，几乎还不到我的肩，让人总想这么顺势搂着母亲的肩膀，好好儿地陪她唠唠家常。值得欣慰的是母亲还康健着，多年来养成的勤劳习惯使她闲不下来，60多岁的人了，一直不肯歇一歇。早上在食堂上班，下午还要照顾自己的三分葡萄地，她说自己家种的葡萄甜，没农药，夏天小一辈的孩子都放暑假回家了，正好吃上奶奶种的葡萄。在我们的再三劝阻下，去年才把田地交给人家管了。前几年女儿读小学，因为我和妻子工作忙，很多天是母亲踩着三轮车接送。一个徐徐踏车的奶奶，和坐在车兜小矮凳上的孙女，总让人感慨万端；如今女儿去读初中了，母亲也常唠叨，晨晨这星期来不来，来了让她上奶奶这儿来，我给她藏着番薯枣子呢。

说起番薯枣子，那可是我们小时候最好的零嘴。当时家里四个孩子，姊比我长一岁，我是家里的老二，下边还有两个弟弟，条件十分艰苦。父亲身体一向不好，家里就靠母亲一人支撑着，每天忙里忙外也从不说一声苦。岁末地里空闲一些，母亲就不忘给我们张罗零

嘴。炒豆子、爆米花、自己酿白酒做甜酒酿，最多的则是番薯枣子。番薯成熟的时候，我们总跟着母亲去地里，把缠缠绕绕的藤一串儿拔起，母亲就用锄头翻，一锄头总能挖出好几个胖胖的番

薯，捡起来扔进背篓里；我们兄弟几个大一点，就跟母亲抢锄头，我翻地，弟弟捡。大个儿的番薯或者卖掉，或者搁几天煮粥吃。个儿小的母亲就做成番薯枣子，给我们当零嘴。做法很简单，一个个洗干净，不去皮，放在锅里煮熟，最好能洒些糖（当年往往是没有的），然后摊在竹席上晾干，藏在罐子里，能吃好几个月。在那个艰苦的年月，真称得上是美味了。每天放学，伸手到罐子里摸几个番薯枣子吃，咬起来有一股韧韧的香味，又好吃又饱肚子。

如今生活好了，渐渐地不吃这些土特产了，但母亲还是每年做，记着儿子又惦着孙女，这一份慈爱之心怎能不使人感动？老舍曾说：“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我的老母亲，她把一些小辈一个个都藏在她的心理头，无论我长得多高多老，在她心中，也永远是孩子。

因为工作关系，一次次搬家，离母亲是越来越远了。节假日抽时间去坐坐，母亲总是特别高兴，忙前忙后的。我和妻子过意不去，常常自己买了菜去，妻子洗菜，我掌勺，为母亲做几道爱吃的菜，更陪母亲说说心里话。母亲常在外边赞我们的好，说她的几个儿子总算都很安分，几个媳妇都很孝顺。心里惭愧啊，“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与母亲比起来，我们的付出怎及得上她所给予我们的？端午时妻子又塞给母亲几百元让母亲自己买点喜欢的东西，姊姊昨天电话里说“妈舍不得买呢，妈说藏着等晨晨考上重点高中了给晨晨作奖励……妈说一转眼这些孩子一个个要读大学啦要结婚啦，做奶奶的也开心呀，得表示一下呢……”我不禁慨然动容，我的老母亲哟。

## 画在米上的花儿

顾常平

当父亲咬紧牙，把一担刚从米厂轧来的米，挑到二楼的米缸旁放下，撩起衣角擦汗时，母亲总喜欢轻拍几下米箩，拍平整米，伸出右手的食指，不徐不疾在米上画一朵美丽的“花儿”，然后望着父亲笑一笑，一脸的平和、温柔。父亲擦好了汗，望着米花也是一脸的满足。

我问母亲为啥要画花，画的是啥花。母亲只笑着回答了我的一个问题：“可以防老鼠来偷吃啊。”在农村，老鼠是家虫，似乎啥都要偷吃。

这么神奇的花儿，我要学，母亲就教我。教了几次，虽画得歪歪扭扭的，但我终于会了。从此，画米花似乎成了我的专利。我还用粉笔画把米花画在门板、水泥地，甚至一棵树上，让米花到处都是。

但我始终不知它叫什么花，儿时不知，现在依然不知。也许它本就没有名。它没名儿我就给起一个，叫米花。幼时常听父母讲米的故事。那时，离饥饿的岁月没几年。譬如掘革命草根晒干泡茶喝；譬如谁得了浮肿病，到指定的地点吃几次细糠就好了。父母讲这种故事，大多是家里没什么下饭时。

米在我家的地位几近神圣，谁也不会浪费。我们吃过的饭碗都干干净净，不会剩一粒饭。我和三哥的记忆里，还留有捡起掉在地上的饭粒吃进嘴里的委屈。

母亲的手很巧，能剪窗花，剪鞋样，还能用米做出各种点心来。母亲做过的点心，主要的有金团、粽子、汤果、浆板，还有饅头面。虽都不常做——都是节头节

尾，或家里有木师、漆师时做一点——但逢大节必做。

煮饭偶有馊鱼。多数的馊鱼都被水泡后和到下一餐饭去了，只有少数的馊鱼会被母亲小心地加工成我们的零食。

现代的生活中与米连在一起的，是电饭锅、高压锅、煤气灶、微波炉。而我儿时，能与米连在一起的，是尺八镬、羹架、汤锅、火钳、火耙、火熨，稻草、麦秆、菜子秆、柴片，还有大灶、灶头桌凳……现在每参加小型的聚会，我们多爱选在带有“大灶”字样的店。看来怀念大灶生活的，不只是我一个。

后来生活好了，米似乎变得不用关心了。但记忆深处米的色彩，并不因生活好了而褪色，特别是父母。母亲病重时曾因缺氧过多出现过幻觉，有次半夜忙着要起床，说：“常忠来了，要弄饭去。”常忠是我的小姐夫。母亲临终前几小时还是清醒的，嘴巴一张一合似在说话，但我听不清，就叫大姐。大姐听了后问母亲是不是“叫他们饭吃点去”？母亲点点头。那时，陪着母亲的人很多。后来我问大姐是怎么听出来的，大姐说，是口型看出来。母亲一生对客人说过的最多的话，就是“饭吃点去”。

父母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的话里还是离不开米。和米饭连在一起的，还有我们，还有很多的亲人。父母每每呼喊的一句“吃饭来了”，是一生中最灿烂的回忆。

每至独处时，我的脑海里还时时浮现母亲画过的米花来，同时浮现的，还有我画在各处的那些米花。

## 母亲的双手

苏占鑫

休假归来，整理衣物时无意中发现每件衣服内侧的右下角都被缝上了一个小小的“苏”字，和母亲通完电话，才知道是她连夜缝制的。问其缘由，母亲说：“你上次回家说部队的衣服都一样，容易被拿错，我就想在衣服上给你做个标记，以后好找也方便整理。”挂完电话，泪水不禁流了下来。我只是随口一说，没想到在母亲那里却成了天大的事情，以至于她连夜赶制，何况她的双手因为关节炎已经严重变形，要拿起绣花针一针一线地在每件军装上缝制出一个个字，需要承受多大的痛楚可想而知。

我来部队已经七个年头，虽然每年都有假期，可是真正陪母亲的时间却屈指可数。每次回家不是忙于走亲访友，就是陪朋友聚会，母亲却从未有过怨言。在我的印象里，母亲的手好像一直都是柔若无骨的青葱玉指，依然能像小时候那样给我变出糖果和纸鹤。自从父亲意外离世之后，母亲一个人承担起了我们兄弟二人的生活所需，依靠她那双灵巧的双手通过编织手工艺品将我们兄弟二人抚养成人。那时年幼的我总喜欢搬个马扎陪坐在母亲身边，看她编织。在她的手中干枯的竹藤就像拥有了生命，扭动着多彩的舞姿被编织成一个又一个精美的手工艺品。

高考那年，母亲为了给我攒足大学的费用，白天跑到建筑工地给别人打工，晚上回来还要熬到凌晨一两点钟编织手工艺品。为了尽可能赶在我开学前攒够学费，她放弃工地做饭的工作，像男人一样搬砖头、和水泥。那时一个手工艺品的手工费才两毛钱，工地干一天20块。远在北京打工赚学费的我，每次和母亲打电话，她都会叮嘱我好好工作，注意吃饱穿暖，却从不和我提起她在工地干活的事情。直到弟弟给我打电话，说母亲的双手被水泥烧破了皮，被竹藤划破了手，我才知道母亲在工地打工的事情。开学那天母亲用十指缠满创可贴的双手，从衣兜里掏出了8000多元现金塞到了我的手中，嘱咐我好好学习。当我拉着母亲的手，轻轻地抚摸着手上龟裂开的伤口，告诉她学费我已经攒够时，母亲却说：“你攒的那些钱就当生活费吧，妈知道城里的生活不比农村，那里的消费水平高，如果钱不够花就给妈打电话。”

如今，我成为了一名军人，每个月都会定期给母亲寄一些生活费，而母亲却舍不得花，总是把钱全部攒起来。她总说：“这些钱妈用不着，给你攒起来以后结婚用！”为了方便和母亲联系，我花钱给母亲买了一部触摸屏手机，她知道我的工作性质，怕影响我的工作，总是发一些简短的信息：“儿子，在部队好好工作，勿念！”“你那边天冷了，自己多穿点衣服！”“妈身体很好，不要想家！”我经常想象只有小学文化的她，努力用双手在屏幕上写下对儿子思念的样子。去年八月，弟弟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母亲的手肿胀得厉害，一碰凉水就疼，他带母亲去看病，母亲却死活不让，只能向我求助。当时部队正忙于训练，我实在脱不开身，只能给母亲打个电话，催促她去看病。母亲却口口声声说没事没事，直到我生平第一次对母亲发了脾气，她才答应我去看一看。

这次休假回家，我带着母亲去城里的医院看了病，拿了药。医生说母亲的手已经有些变形了，以后再也不能干重的农活，只能慢慢调养。我拉住母亲肿胀的双手，轻轻地她说：“妈，您该享福了，以后，我养你！”



本版摄影 柏南 投稿邮箱：essay@cnb.com.cn

第5623期



其实，运动本身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网球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个已经高度职业化的全球主流项目，是小球中的大球，所以就有了改革的可能性。

当时我们国家网球队的成绩也不像现在这么好，大家众口一词地表示：改革是错误的。如果不是孙主任力排众议坚持体制改革的话，我们这一茬运动员可能最终也就和前辈一样悄无声息地沉寂了。直到2011年拿到法网冠军后，这个一直存在争议的“改革”才得到更多的支持。

我一直都希望能通过单飞的形式得到更专业的训练。早在2004年我复出的时候就有过这个想法。刚复出的时候成绩很好，国家队想要我2005年归队，但当时我还在华中科技大学念书，就向队里提出可不可以自己做，不进国家队，因为这样我还可以继续上学读书。当时我说的“自己做”，其实也只是把编制留在湖北省队，并不等同于后来的“单飞”，只是不想去国家队那么麻烦。这个要求没有得到批准，鉴于当时国家的体制，留在哪里不是个人可以轻易说了算的，最后我还是进入了国家队。

说实话，我的性格太直了，一些场面上的事情，我不会做，也不善于做，因此显得不合群，也让领导很难受，所以在国家队，我不算是很受欢迎的运动员，至少自我感觉是这样的。他们可能会想，羊群里怎么忽然就跑出一只骆驼来了？当然不会有人公开这么说，但那种微妙的距离感无处不在，没有赛事的时候，我基本没什么存在感，人家看我的眼神像是在看一扇玻璃门，穿过我的身体直达远方。当某项重大赛事到来之时，我忽然又炙手可热了。大家排着队亲切关怀，这给我关怀的啊……躲没地方躲，藏没地方藏——躲球场打球都不行，人家照样能找到你。

这种事次数多了，自己慢慢会领悟。时间长了，我也习惯了，也麻木了。但长期这么相处下去，其实挺没意思的，我也难受，领导也难受。

还是单飞吧，单飞就是双赢，大家都痛快。

其实我跟国家队的关系也不算紧张，我们并没有多大的矛盾，某种层次上，我们其实还是共同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但是有些事情有些时候没有得到及时的沟通，以讹传讹，已经离最初的原意有一些偏差了。等到队里的指示再一层一层反馈回来，最后到我这儿，也偏离了本意变得面目全非。有时实在匪夷所思，我只好去当面申诉，弄得队里也很吃惊：我听说的怎么不是这样呢？

姜山告诉我，有些气要受，有些事得忍。可是有些事我忍不了，你让我吃苦可以，受累可以，但是不能哄我、骗

我。如果哄我、骗我，我索性就把一些确定不了真假的消息直接屏蔽了。我也不太愿意去解释。我觉得，你如果认为这是杯子，我再怎么告诉你这是碗，你也不会相信，因为你已经有自己的想法了。好吧，你说杯子，那就是杯子。

现在自己做自己的主，担自己的风险，打自己的成绩，我觉得自己虽然比以前累了，但精神上比以前轻松了。现在挺好的，最起码不会为一些原本不该属于体育范畴之内的事分心。

2004年到2008年，正好是一个奥运周期。2008年奥运会开始的时候，我被伤病困扰了很久，成绩不见起色，渐渐萌生了去意，便和国家队的相关人员谈了自己的想法：如果不能自己自主参赛，去做一个真正的职业球员的话，就退役算了，这样我还可以继续未完成的学业；如果可以自己打，我就继续打下去。2008年我已经26岁，作为一个职业运动员，这个年龄就差不多了，这种环境、这样的方式我也受够了。我想体会一下真正的职业网球是什么样子的——像国外同行那样自己请教练，自己有选择参加比赛的自由，能够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技术水平配备自己的团队，能让自己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才是职业网球。

打了十几年网球，却从来没有体会过真正的职业网球，这是我当时人生中最大的遗憾。那时远没想到自己能拿大满贯冠军，就像隔着窗户纸往外看，只知道外面有星星、月亮，具体的样子却是雾里看花，无从捉摸。

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徐建国